



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Motivations and Location Choice

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 ——动机与区位

陈延晶◎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Motivations and Location Choice

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

——动机与区位

陈延晶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 动机与区位/陈延晶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36-1561-7

I. ①对… II. ①陈… III. ①对外投资—直接投资—研究 IV. ①F8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9036 号

责任编辑 王中梅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1561-7/F · 9319
定 价 39.8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68344225 88386794

目 录

1 导 言 / 1

- 1.1 内容介绍 / 1
- 1.2 重要发现 / 8
- 1.3 结构安排 / 9

上篇 动机篇

2 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 13

- 2.1 优势 / 13
- 2.2 内部化利益 / 17
- 2.3 综合利用的观点 / 22
- 2.4 其他动机 / 25

3 针对动机的实证研究综述 / 27

- 3.1 优势 / 27
- 3.2 政府措施导致的市场不完全 / 32
- 3.3 垂直动机与水平动机 / 40
- 3.4 跨国经营与公司价值 / 44
- 3.5 以进入模式检测动机 / 50

4 对华直接投资动机实证分析 / 55

- 4.1 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命题 / 55
- 4.2 获取无形资产交易内部化利益的实证分析 / 61
- 4.3 检验水平动机 / 67
- 4.4 检验出口平台动机 / 72

本篇数据附录 / 77

下篇 区位篇

5 区位理论与区位要素分析 / 81

5.1 新古典区位理论 / 81

5.2 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区位理论与总均衡模型 / 83

5.3 其他区位理论 / 86

5.4 区位理论所揭示的区位因素与重要观点 / 87

5.5 对经典区位要素的局部均衡分析 / 88

6 集聚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 95

6.1 集聚经济 / 95

6.2 集聚经济与 FDI 区位的实证研究现状 / 105

7 中国集聚经济现状 / 109

7.1 城市化 / 112

7.2 行业集聚 / 115

7.3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 / 118

8 集聚经济影响 FDI 区位分布的理论机制 / 121

8.1 集聚经济影响公司预期利润 / 121

8.2 集聚经济效应的空间性 / 130

9 中国集聚经济与 FDI 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 132

9.1 总量水平数据的回归检验 / 132

9.2 行业水平数据的回归检验 / 148

9.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156

9.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167

本篇数据附录 / 172

参考文献 / 174

后记 / 207

1 导 言

1.1 内 容 介 绍

1.1.1 精梳理论

理论是实证的基础与导向，基于此本书首先精心梳理了两类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① 理论：动机理论与区位理论。

本书以企业的经济理性为出发点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没有将传统理论学说进行简单罗列，而是根据各学说的本质将传统动机理论归纳总结为企业优势的利用与维持、实现跨国经营的内部化利益以及跨国综合利用的观点。其一，作者认为垄断优势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探讨都是以企业优势为出发点，目的都是利用已有的或试图获取的优势为企业带来最大化的利润。只不过，三个理论分别强调了不同特质的优势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作用：如，在垄断优势理论中这一企业优势是难以模仿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企业优势是与东道国的更劣势的产业比较而言的，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企业优势则是不断变化的。需要指出，不同特质的优势的确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上的差异，三种传统理论学说在解释某种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上均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三者又统一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本质——拥有或维持优势并将优势利润最大化。其二，内部化理论的出现是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探讨中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这体现在它正确地指出了无形资产市场的不完全性，这一不完全性会集中体现在国际市场交易中。除了内部化

^① 外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间接投资，本书中所提到的外资均指对外直接投资。

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也提到了无形资产，但是两个理论捕捉的无形资产的特质存在差异。垄断优势理论强调企业本身拥有难以模仿的优势资产，而无形资产是该优势资产中重要的一类，它强调无形资产难以模仿的特质。而内部化理论强调的是企业将无形资产投入到市场交易中将难以得到合理租金，所以内部化理论强调的是无形资产交易的市场不完全。但是在目前的实证研究，很难明确指出无形资产代理指标捕捉的是市场不完全还是企业难以模仿的优势，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所以很多实证文献的理论基础模糊不清。其三，“综合”观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这一观点的代表，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将已经拥有的企业优势、跨国直接投资的内部化利益和在东道国能够获得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权衡而产生的行为，也就是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理论的综合。但 Itaki (1991) 明确指出“所有权优势”的冗余性，及其与“区位优势”的共生性，再加上“区位优势”概念上的模糊，因此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是严格意义的理论，而是一个因素分类法。作者与 Itaki (1991) 的观点相同，但是作者认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理论，但对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与本书相关的另一重要理论是区位理论及其模型演绎。早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它以微观厂商的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区位因素分析，预期了市场、生产成本等经典因素对于外资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近十年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通过精确的总均衡理论模型表明了工资、生产成本、中间投入品成本等外生变量以及对这些外生变量造成重要影响的因素，如贸易成本和集聚经济都是重要的区位因素。而行为区位理论对于决策人的主观影响和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外界环境的影响给予了必要的重视，预期了外资企业对于集聚地的区位偏好源自于决策人对于成本的节省和不确定性消除的平衡而导致的跟从行为。结构区位理论提出了区位的系统观念，认为不同区位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共同存在于宏观经济整体中。区位理论不仅明确指出了市场、投入成本、运输成本、贸易成本和集聚经济等因素对于区位决策的影响，而且指出了不同区位间可能存在着经济依存关系，否定了区位的孤立性。对区位理论及模型演绎的梳理明确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研究中计量模型的建立方向。

本书重点考察集聚经济的空间依存性及其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

影响。基于此,本书对区位理论综述的侧重点有二。一是回顾并充分讨论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总均衡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企业区位选择的观点不同,新经济地理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经济收益递增、规模经济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等角度探讨企业区位的选择。二是详细讨论集聚经济影响公司预期利润的三大机制——“共享”机制、“配比”机制与“学习”机制。对两类理论、多个模型深入的探讨全面演绎了集聚经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根源,为两者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也有助于更严谨地完成第九章集聚经济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地理维度的实证分析。

1.1.2 实证研究综述

丰富的理论研究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也为实证研究指出了具体方向。在对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梳理的基础上,通过精读并归纳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动机领域的实证文献,本书综述了五个方面的实证研究。第一,对优势的关注。优势在多个动机理论均被提到,无论其实质如何,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大量基于不同的理论、使用不同的方法与样本数据的实证文献,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拥有优势是引发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第二,政府措施导致的市场不完全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内部化理论阐明了政府政策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对这一因果关系的理论引申使得来源国与东道国的政府措施都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动机领域讨论的重点。大量的实证文献关注来源国或/和东道国的税收、补贴、贸易政策以及制度等因素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流的效应。但由于各国政府措施的巨大差异以及实证研究所涉及的关键代理指标的差异,使得这类文献几乎没有可比性。实证结论只是说明政府措施的确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但这种影响根据具体措施、具体国家有差异。第三,对于水平动机与垂直动机的检测。学者们发现根据市场失灵的差异所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不同的动机,分别被称为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与垂直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多的文献对于水平与垂直动机的实证检验是以知识资本模型(Knowledge Capital Model,又称KK模型)为框架进行的,也有文献从其他角度使用其他方法检测这类动机,大部分的研究结果为垂

直动机提供了证据,不过也不能否认水平动机的存在。第四,跨国经营与公司价值。涉及到这个主题的有两类研究,一类是跨国经营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内部化理论预期将跨国无形资产交易内部化可以节约外部交易成本,提高公司绩效。除此之外,国际扩张可能会带给公司规模经济、扩大市场份额,得到学习效应、获得廉价资源的利益,从而提高公司绩效。但是另一方面,跨国经营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整合成本,从而对跨国公司价值增值有消极影响。针对这一命题的实证结果较复杂,目前,对于跨国经营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提出了U字型、倒U字型、S型三种结论,作者认为三阶段的S型结论更有概括性。第二类讨论跨国并购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实证结论更侧重于表明跨国并购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巨大差异。第五,从进入模式角度来讨论动机。根据内部化理论,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会表现为不同的外国市场进入模式。这一类文献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内部化理论的预期相符,即获取交易成本利益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动机之一。不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还指出,跨国经验的积累、控制成本的存在以及东道国市场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交易成本内部化效应的发挥,从而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

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文献中,本书对涉及到集聚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主题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主要内容有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以及针对中国的研究情况。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的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针对集聚经济这一特殊影响因素展开的研究并不多。本书第6章报告了16篇可以为集聚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性提出实证证据的文献中与集聚经济相关的实证结果。肯定了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外资集聚程度与行业专业化水平是吸引外资流入当地的重要决定因素。实证文献的检验结果相对一致。在已经有的研究中也证实了服务业集聚、Keiretsu集聚^①,对于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但内资企业集聚的实证结果出现明显差异。另外作者在研究中发现,集聚经济的其他类型——如城市化、上下游行业集聚效应,在此一线的实证研究中并未广泛涉及,不能得到更有效的验证。在集聚经济空间依存性方面提供参考文献较少,在

^① Keiretsu 是指日本许多大公司的组合,包含银行、工业机构、供应商和制造商,其成员持有成员团体的股份,成员间相互贷款,并从事联合投资。

仅有的几篇文献中也仅涉及了外资集聚跨国空间依存的现象，其他集聚类型的空间依存性尽管在集聚经济一线的其他研究中多次被强调，但在对某一地区 FDI 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中，以作者的知识范围来看，并未有所涉及和引起重视。这为本书下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明确方向。

1.1.3 四个实证命题

1. 关于投资动机

基于对国际上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领域的实证研究现状，根据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特点，并结合对样本数据的特征，本书选择性地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三大动机，获取内部化利益、谋求中国市场的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以及出口平台型投资动机，对应的三个实证命题是：

命题 1：外国公司以高控制权模式进入中国以最大化获取内部化利益；

命题 2：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以谋求中国大区域市场；

命题 3：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进行生产活动并出口。

在本书 4.2 节，基于内部化理论分析框架，使用 2004 年 NBSC 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样本，从跨国企业的公司特征及其所在行业特征的角度考查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选择——合资还是独资。通过使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交易成本代理指标与进入模式间的相关关系，捕捉了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对于建立全资子公司概率的影响，实证结果符合预期。国外类似主题的实证文献并没有针对中国市场并从公司及行业特征角度的考量，4.2 节的内容补充发展了这一主题的实证文献。本书 4.3 节针对第二个实证命题进行检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在实证文献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验证，不同的是，本书中对于中国市场的再检验则考虑了中国大市场的地域特点，对市场变量进行了地理扩增，对比检验当地市场、周边市场对于外资的影响力，拟从市场的地域角度扩展这一主题的实证分析，以期得到更多的细节信息。针对命题 3 而言，国际上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平台型动机的文献较少，而国内尚没有关于出口平台动机的实证分析。为扩展这一线的研究，在 4.4 节以 Ekholm, Forslid and Markusen (2007) 等人的研究为参考，使用 Cole, Elliott and Virakul (2010) 的研究方案，基于中国 2004 年经济普查的跨国公司数据，重点考察分析持出口平台型动机的在华企业特征及其所在的行业特征。

作者最大化地利用样本数据提供的公司水平信息，较全面合理地挖掘并检测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三种动机。使用细节数据以及国际相关文献所广泛使用的计量模型与计量方法使实证结论在现有计量手段下具有较高可信性。需要指出，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看到对于动机的讨论仍然任重道远，在华跨国公司动机的复杂性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一一澄清，更具体的公司信息和更严谨的实证方法需要突破性地运用在该领域上。

2. 关于区位因素

集聚经济可以提高公司的生产力，增加公司的潜在利润，所以集聚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集聚经济也是本书下篇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讨论中的重点。对于集聚经济与公司区位选择关系的探讨无论是对公司选址行为的研究，还是对于了解集聚经济本身都有益处。迄今为止，大量的文献涉足此领域，但仍留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本书基于前人的研究，拟从新的角度——地理维度充实该领域的文献。具体实证命题为：

命题4：集聚经济对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存在空间外溢效应。

一方面，作者认为实证分析的进步不仅体现在越来越细分的数据和不断发展的新方法的使用上，还体现在对各种已有研究成果的认识和应用上。随着对集聚经济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集聚特性被识别。可见，集聚经济的作用机制相当复杂，对集聚现象进行合理区分则有益于深入分析，以便获取到与集聚现象相关的更充分的信息。但在与此相关的大量研究中，集聚经济常常被简单地以一个粗略的总量指标来捕捉，这往往会造成信息损失，甚至会造成计量偏差，因此本书作者将首次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区分集聚现象的种类并分别考查它们对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集聚经济的研究，尽管成就巨大，但仍旧有许多尚不明确的地方。笔者认为涉及到此问题的实证研究需要为这些信息留有余地，更有义务在实证分析中不断地验证和探求，丰富此系列的文献并求得发展。在涉及此类问题的文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定义集聚经济地理范围的标准方案主要是基于如省、市、州、郡等行政划分，同时检验集聚经济对于同一行政区划内经济活动的影响。也就是说，传统的实证方

法隐含着集聚经济具有空间独立性的假设。而这一假定没有任何的理论支持,只是基于实证检验的便利性而考虑。事实上,以前人对于集聚经济的研究成果看来,集聚经济的存在与否并不能以疆界的划分作为依据,疆界的存在并不能阻挡经济活动的集中。但是集聚经济外溢的地理范围也未在文献中得到清楚的证实。因此作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打破了集聚经济的影响仅局限在“当地”的假设,在地理维度方面对集聚经济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更谨慎的实证研究,将集聚经济可能作用的范围扩大到相邻的省份或地区,检测集聚经济对外资区位选择的省内和跨省两种效应。

从上述两个方面,本书对于区位因素的实证设计目标是:一则可以得到有关集聚经济的更丰富的信息,尤其是可以为集聚经济的地理范围提供证据;二则也为地区政府在引资方面提供有用的信息。除了经典的地区因素——市场、劳动力成本与质量、基础设施、贸易成本等以外,本研究更注重以前往往被忽略的有效利用不同集聚类型地理特点的建议,针对省间合作提供依据。

针对命题4,作者构建了地理扩增的局部存量调整模型,对1993~2004年FDI在中国大陆29个地区进行选址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尤其是检测各种集聚经济对于外资区位的省内和省间两种效应。各省外资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控制外资的自增强效应,用一般动差法(Generalized Moment Method, GMM)回归方法将各种集聚经济变量与其相应的地理扩增集聚经济变量和其他的地区特征一起进行回归检验。同时,本文使用1998年到2006年中国大陆29个省29个行业的普通面板数据,建立地理扩增的随机效应模型,分别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GLS)和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法对影响行业FDI水平的各种集聚经济变量与其他决定因素进行进一步检验,以鉴别总量数据分析中所不能揭示的问题,并对其他变量实证结果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需要指出的是,来自一国内部的数据可以较好地避免跨国数据的样本异质性和数据不可比性。而且中国曾经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两个历史时期,政府政策曾经支持经济活动和基础建设的空间分散化;而改革以后的政策则倾向于优先将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同时,中国广袤

的国土、多样的自然条件、巨大的区域间差距等都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多样性。因此，中国为了解跨国公司行为提供了好的机会。除此之外，FDI 在中国，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高速增长给中国 FDI 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数量上的保证。中国的 FDI 和中国的制造业集聚有其独特之处：一是中国的制造业本身存在严重的非均衡分布的现象，而同时中国的 FDI 绝大多数投资于制造业^①；二是中国早在开放其他行业之前就开放了制造业，因此，政策的偏向使得制造业行业集聚对于 FDI 的区位选择相比于其他国家更加有意义，使得这种间接的检测方法更加有效^②；三是中国的外资主要来自于亚洲国家，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由于严重差异的文化、地理距离以及不同的社会与种族所造成的异质性干扰^③。基于这些优势，本书的相关研究结果具有可信性。

1.2 重要发现

通过梳理理论、综述实证文献以及对在华跨国公司动机的实证分析，本书首先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三种动机提供了证据，同时也得到了关于在外直接投资动机的丰富信息，鉴别了持有不同动机的外资企业特征与其所属行业特征。对于第四个命题的实证分析肯定了集聚经济的理论预期，对于不同类型集聚经济于 FDI 的跨地域的影响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证明了集聚经济的空间外溢，也为集聚经济地理维度的研究提供了佐证。对于这些重要结果，本书基于现有的对于集聚经济的相关研究成果，除了对于集聚经济的本省影响进行解释外，重点对于不同类型集聚经济在跨地域影响研究中迥异的表现进行了理论探讨。这些信息对于中国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引资政策的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

① 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本文实证研究部分所使用的样本期间内，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制造业的比例约为 67%。其中，2006 年制造业引资的比例是 63.6%，位居第一。

② 中国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就打开了制造业的大门，而其他行业，尤其是城市化的重要基础行业——服务业是在中国人世之后才逐步开放的。

③ 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2006 年来自亚洲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是 63.9%，在 FDI 所有来源地区中，位居第一。

1.3 结构安排

本书按照研究重点分为两篇：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定。上篇包括第2—4章，按照研究顺序分别是动机理论综述、动机实证综述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实证分析。下篇包括第5—9章，第5章为相关区位理论，第6章对于集聚经济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进行综述，第7章对中国经济集群现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的特点进行统计分析，第8章探讨集聚经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理论机制，第9章对集聚经济与在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深入探讨。

上

篇

动

机

篇

